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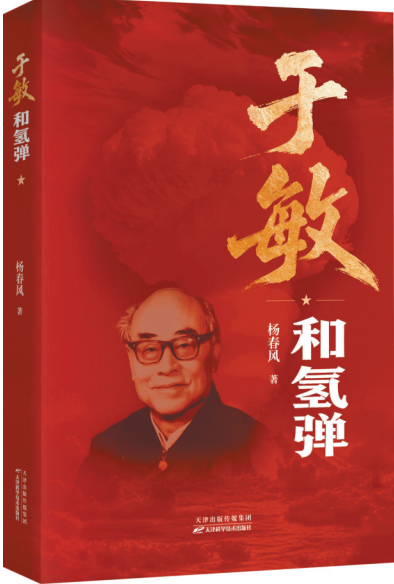
两万里溯源寻找“硬核答案”

——专访《于敏和氢弹》作者杨春风

本报记者 吴丹

看点 今年¹是于敏院士诞辰百年，恰逢《于敏和氢弹》新书发布，本报记者专访省作协报告文学专委会主任、盘锦市作协主席杨春风，听她讲述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和文学思考。

“报告文学是‘六分跑，三分想，一分写’。”杨春风说，唯有“跑出来”的写作，才能穿透文献的冰冷，触碰到人物真实的心跳。两年时间、两万里行程，杨春风循着于敏的人生轨迹实地溯源，用脚步丈量出一位科学家的精神版图，也完成了对“两弹一星”精神的深情致敬。



一部“跑出来”的报告文学

本报记者: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要为于敏院士立传？将个人命运置于全球核武器发展脉络中的宏大视角，在同类作品中并不多见，如何想到以这种方式来解构全书？

杨春风:2024年初，出版社邀我创作于敏院士研制氢弹历程的故事。当时，我对核武器的了解并没有超出大众的寻常认知，对这项陌生事物从零开始的探索，让我更加清楚，要交代哪些事情，才能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与理解于敏院士的工作与贡献。

一番探索下来，我得以搭建一个国际参照系：纵向梳理核武器在世界范围内的源起与迭代，横向铺陈冷战背景下大国之间的核博弈。这样的叙事框架，实现了我的两个心愿：一是解释清楚了时代压力来自何处，使我国启动核事业的时代逻辑变得具体可感；二是重新定位了于敏工作的历史坐标，把他对氢弹理论的突破，放到了国际核武器研发的时间线里去书写。

本报记者:省作协主席庞宝国评价您这次“主动跳出地域视角，自觉承担文学使命，将创作视野上升到家国叙事、功勋叙事、时代叙事”。请问，地域书写与家国叙事在您的创作脉络中如何一脉相承？

杨春风:长期深耕辽河口地域文化，突然要写一位“两弹一星”元勋，说忘志是假的。但深入采访后我发现，于敏院士的故事天然具备一种超越地域的力量——他是从芦台小镇走出来的，他的成长本身就是从“地域到国家”的跨越。我没有“就于敏写于敏”，没有“就氢弹写氢弹”，没有“就中国写中国”。这种跳出，不

是对地域写作的背离，更像一种延伸——过往对辽河口地域文化的执拗挖掘和坚守，恰恰训练了我做田野调查、梳理史料的能力。

曾经为了写《逐稻者》，我走访了盘锦16个朝鲜族村屯。这种“跑”出来的写作方式，在《于敏和氢弹》中得到了延续。以前跑的是辽河口，这次跑的是大半个中国。那种对事实较真的劲头、对细节不放过的心态，是在辽宁一篇篇“跑出来”的作品中打磨出来的。所以说，本书的文学底色里也流淌着辽河口的基因。

先做学习者再动笔写作

本报记者:您在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上坦言，《于敏和氢弹》是迄今为止最具挑战性的一次创作，为什么这么说？

杨春风:核武器研制布满层层高深的物理专业门槛，于我而言，第一步不是直接动笔写作，而是先做学习者。我反复啃读专业文献、史料、科学家口述，再剥离繁复的物理学过程，抓住事件与人，把高深的原理设计过程还原成人的困境、人的探索、人的突破。

把专业概念转化为通俗表达，绝不是一次就能成型，很多段落我会反复打磨。印象很深的是关于核武器上下游工程链的表述。那是一个庞大、繁复的工程，在这个部分我多次易稿，喊来女儿试读，以她能否读下去又能否读懂为准。我的取舍原则是：科学内核一丝不能错，表达语言尽可能向大众靠拢。

本报记者:于敏院士的故事此前已见诸媒体报道，本书为读者提供了哪些过去未曾充分呈现的新内容？

杨春风:本书在于敏院士已广为传播的故事基础上，补充了不少新内容。比如

完整还原了他在原子能研究所的10年经历；厘清不少历史细节，增补了部分流失的时间线，也添加了许多有烟火气的生活细节。通过补充、延展，把人物、时代、世界格局打通，让大家看到一个更立体更完整的于敏。

用最朴素的语言让读者代入

本报记者:这是您第一次以第一人称呼写报告文学，为什么？

杨春风:本书初稿依然用第三人称，后来深感很多东西不好表达、很多情节不好处理，才最终在前辈的建议下克服心结，改成第一人称。事实证明对这个题材而言，第一人称是妥当的，这样就能把我在实地走访、史料研读过程中的感受与体悟放进文本里，借此把读者更顺畅地代入人物的内心世界。

本报记者:您如何平衡“纪实”的严谨”与“文学的表达”？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有怎样的追求和思考？

杨春风:严谨性永远是纪实文学的根基，文学表达是生长在这块根基之上的枝叶，二者不是对立，而是共生的关系。书写这样一部关乎重大国防历史、核科学家真实人生的报告文学，真实性容不得半点损伤，纪实严谨性是不可退让的底线。

当我把史料读透，走进人物所处的时代，读懂他们的处境、挣扎、取舍，那些潜藏在冰冷档案背后的人的情感，就会自然浮现出来——于敏面对事业抉择时的内心，他所承受的氢弹原理迟迟不得突破的煎熬等，本身就是很“文学”的，事实本身就自带张力。所谓文学性，不是靠华丽辞藻硬写出来的，而是在吃透事实之后，把藏在史料缝隙里的人性、情感、时代气息打捞出来。

鲁迅小说中的“无效劳动”

顾农

鲁迅的小说内容博大，思想精深，时读时新。最近重温一些篇章，忽然注意到，他多处“揭发”中国读书人的“无效劳动”，禁不住有感而发。

几乎无人不知的孔乙己，参加基层的科举考试，考了很多次，始终没有获得任何功名。他本人又不会营生，好喝懒做，愈过愈穷，一生悲惨，却仍然满口“之乎者也”，成为当地的一个笑柄。旧时代的读书人参加科考原属平常，既然此路不通，那就应该另打主意，至少做点有效劳动来谋生吧，为什么非要死守着一件作为上流社会读书人身份标志的长衫，长期死要面子活受罪？《白光》中的主人公陈士成，也是

多年参加科考，一直榜上无名。此公相当财迷，后来变得神经兮兮的，幻想挖得宝藏一夜暴富，却最终一无所获，死于非命。

新派知识分子比起他们这些可笑的前辈来固然有些进步，可惜也高明不到哪里去，受困于“无效劳动”的作风似乎未见根本转变。

《在酒楼上》里，那位曾经“连日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”“敏捷精悍”的有为青年吕纬甫，后来忙于一些无聊的事情，沉溺于种种琐碎无谓的私人感情里不能自拔。

更可惜的是《伤逝》里的涓生、子君夫妇，他们曾经是思想新潮的有志

青年，结合在一起以后，住在一处杂院里，与一家小官为紧邻，生活一直毫无生气；涓生当他的公务员，每日埋头于公文堆中抄抄写写；子君则成为一位尽职而平庸的全职太太。

他们的近况是——子君竟胖了起来，脸色也红活了；可惜的是，当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，何况读书和散步。

这就使我也一样的不快活，傍晚回来，常见她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，尤其使我我不乐的是她要装着勉强的笑容。

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，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；对于她的日夜的操心，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，来算着

分甘共苦。况且她又这样的终日汗流满面，短发都粘在脑额上；两只手又是这样的粗糙起来。

在家务事的汪洋大海里，他们夫妇终于一事无成，不久一遇失业的压力，就迅即散伙了。

在鲁迅笔下，各种形态无效无聊的事情，就这样浪费了许多知识分子精力和感情，可悲可叹。现在的情形同孔乙己、陈士成、吕纬甫、史涓生夫妇的时代当然完全不同了，但无效无聊的事情似乎也还不少，单是那些形式主义的检查和表格就耗费了人们大量的时间精力，有时甚至忙得头昏眼花而无可奈何。

书市观澜

传记出版经历结构性转向

姚雪痕

一直以来，国内人物传记出版大多以历史伟人、名人、精英为主，传记价值依附于传主的社会地位与历史功绩。现在，这种情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。以《渠水流过少年心》《毡匠的故事——一个东乡辮毡世家的口述史》《田老师打工记》为代表的一批普通人传记的面世，折射出传记出版领域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转向：传记的评判标尺、写作范式、传播场域、阅读诉求重塑，普通人的生命经验从私人回忆走进公共出版视野。

传记出版最显著的变化，来自于评判标尺的改变：由看重传主的社会名望，转向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，出版机构从看“传主的社会地位有多高”，转为看“传主的命运能否映照一个群体、一套社会机制、一段社会变迁”。传记功能也从歌颂人物功绩，转变为社会观察、民间记忆留存。

例如，《毡匠的故事——一个东乡辮毡世家的口述史》通过讲述一个东乡辮毡世家跨越百年、历经三代的人生历程与技艺传承，呈现传统手工业衰落、少数民族乡土社会变迁。《渠水流过少年心》以一名乡村少年的成长轨迹，还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村教育生态与农村青年集体境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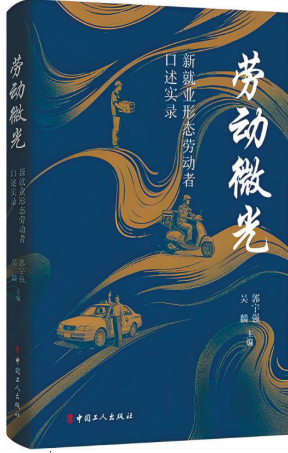
在撰述模式上，这批传记并非传统的出生、求学、建功立业的线性编年体，而是大量融入社会学视角，其中既有第一人称亲历叙事，又有田野访谈、家族口述和社会环境分析，自传、口述史、社会纪实三种文体互相渗透，叙事方式更加丰富灵活。传主不再是全知全能的主角，而是时代洪流中的微观个体。叙事重心则更多落脚于时代局限、行业困境和群体处境。如《娘壕勇猛》通过讲述家政女工的人生经历，透视家政劳务行业底层女性生存现状；《劳动微光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口述实录》，通过外卖员、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口述，反映平台经济下劳动形态的变迁。

从读者角度而言，普通人的坎坷、挣扎、悲欢，与现实生活高度贴合，通过阅读，能够从平凡的主人公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，在他们的命运沉浮中获得共情和现实参照。如《田老师打工记》，书中没有传奇逆袭的故事，只有求职碰壁，为生计奔波的真实日常。读者不必仰望英雄式的高光叙事，而是在主人公的打工际遇里照见当代普通人的生存处境，完成情感投射。

以往，家族手艺、普通家庭往事等多留存于家庭口述、自费私印层面，难以进入正规出版与大众发行体系。如今，出版社主动挖掘普通人的生命叙事，把个体记忆转化为公共阅读资源。市场由此形成正式出版与民间家史并行的二元格局：出版社筛选具备公共样本价值的普通人故事，面向全社会出版发行；民间家史则降低整理门槛，制作仅供家族内部流转的私印文本。二者互为补充，前者打捞有史料价值的个体记忆，后者满足家庭留存往事的个性化精神诉求。

普通人传记在公开出版领域占有一席之地，并非零散的选题热点，而是传记出版一次有意义的转向。历史不再只由大人物书写，平凡个体的生命经验同样拥有记录、传播和研究的价值。传记从歌颂功绩的载体，拓展为观察社会、保存民间记忆的文本，也为非虚构出版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疆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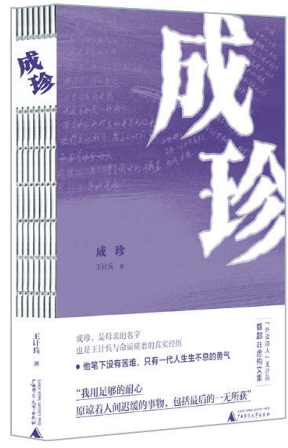
荐书



《劳动微光》
中国工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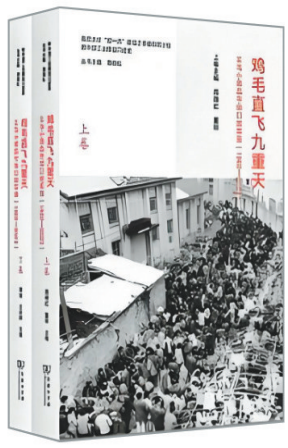
以口述实录的形式，收录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真实故事，忠实记录他们奔波劳作的日常、面对平台算法的无奈，以及对生活的期许。

书中以普通人的经历映照数字时代劳动者的现实困境，既是个体记忆的留存，也是一份有温度的民间史料。



《成珍》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以母亲成珍之名为题，为其写下的非虚构生命记录。全书从一次返乡祭奠出发，以质朴的文字讲述了关于家人、乡土生活及城市生存体验等真实生命境遇。通过打捞家庭记忆碎片，还原母亲在岁月磨难中坚韧求生的历程，映照一代普通乡村女性的生存处境。



《鸡毛直飞九重天》
商务印书馆

作为“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”项目成果之一，本书通过深度访谈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亲历者与开拓者，还原了义乌从鸡毛换糖的敲糖帮，一步步成长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60余年历程。全书以群体口述的民间视角，记录普通商販闯荡谋生的艰辛、市场迭代中的机遇与困境，是改革开放地方实践的史料样本。

提示

读《浮生明灭》，我仿佛看见一个女子，举着一豆烛火，独行在幽暗的时光甬道里。

她抚过石壁上的壁画，辨认古老的字迹，在留白处注目，在错乱处凝思。烛光虽微，照见壁上线条涌动；回声虽小，但隐约有人语轻言。

她停下，侧耳，凝视。浮生明灭，众生挣扎，一个个被模糊的生命，在烛火中慢慢显出轮廓。



一豆烛火洗去千年错墨

胡艳丽

灯下寻微 用人心缝合逻辑断裂处

举着烛火的女子，正是本书作者周琳。4年前，她辞去教职，专心做一件事：用学院派的功底，以讲故事的方式，为那些被反复书写却从未被真正“看见”的人发声。在这本书里，她选择了9个人，以人物为引，自五代至南宋覆灭，大致勾勒出了有宋一代两轮“成、住、坏、空”的生命循环。

书中第一个出场的皇妃王氏便是例证。她一生辗转于他人的棋局之中，从未真正掌握过自己的命运。后唐明宗病重时被卷入权力中心，并非她主动求取，欧阳修却给她扣上“出纳左右，遂专用事”的罪名。大宋太后刘娥当过流民，被赶出府，登临后位又开始新一轮挨骂，做什么都错，什么都不做也照样被泼脏水。周琳将她们放回那个纷纭复杂的时代现场，平视之下，王氏不过是在风暴中竭力求活的女子，刘娥风烛残年身穿袈裟主祭太庙，也不过是给一生的委屈找一处出口。

从王氏到刘娥，以及后来出场的人物，周琳遍寻史料，在字缝里寻找逻辑断裂和遮掩之处，用人心缝合，用人性推演。她关注的从来不是史书写了什么，而是它没写什么。这种书写不向史料要定论，而在史料与推理之间游弋，在有限与合理之间构筑张力。那些隐藏在文字缝隙里的波澜，最终都指向同一个追问：一个人被抛进那样的处境，究竟能活成

什么样？

重回现场 在历史处境中解析人物

周琳并非要为历史人物辩护，她只做一个动作：把人放回处境之中，力求在历史现场解析人物。

对于赵构，周琳不写帝王心术，不写权谋算计，她从赵构被当作弃子的那一刻落笔；被王朝和亲人三次背弃，被金人倾举国之力的武力追杀，称帝后又一度被剥夺帝位。书中不写他的愤怒与不甘，只写他在生死存亡之际那些或主动、或不得已的抉择。赵构的失语，在于他所处的混乱环境，在于“祖宗之法”的有用与无用，他始终在作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。周琳凭借有限的史料与克制的笔法，让人看清了这个一再退缩议和的君王内心的真实动机。

赵构的恐惧，不仅是个人的创伤，更成了南宋政治的一种底色。韩世忠要面对，辛弃疾也要面对。书中分析了韩世忠这位猛将不可能也不完全的忠，对于辛弃疾，更是细细着笔、慢慢分析。辛弃疾对自己的来处始终讳莫如深，“归正人”的身份让他一生尴尬；南宋用其才而不信其志，他执着北伐，却被排挤、被利用，终成镜花水月。

长期以来，我们对宋的想象，常被切成几个互不相通的侧面：忠奸、雅俗、兴亡、彼此矛盾，却被拼凑安放，最终融成一幅面目模糊的宋代长卷。周琳没有正面拆解这幅长卷，而是从9个人的处境出发，用时代的大线条扭住个人经历的小线条，

由小见大，由大见小。于是，宋不只是话本里的忠奸分明，也不只是画里的烟雨楼台，还是一个泥沙俱下的时代，人在其中身不由己地沉浮。

时空对望 以平视之心观照被历史淹没的人

周琳在序言中说，历史不仅服务于现世之人，也服务于逝去之人。这句话道出了本书更深层的用意。打捞史料缝隙中被淹没的面孔，把人放回处境中去理解，最终完成一次跨越时间的对话，逝者因被看见而得以安放，生者因看见而得以自省。

读《浮生明灭》，跟着周琳的文字，一次次潜入那些被史书定性、被后世脸谱化的人生，看他们他们在各自的处境中挣扎、妥协、沉默或爆发，不去审判，不去一语定他人善恶，而是感同身受，同知同觉。那种阅读的张力在于：你清晰地知道他们的结局，却仍被他们走向结局的过程攫住。当你以平视之心去理解那些被历史淹没的人，你也在同一时刻重新理解自己。

浮生如寄，没有人能逃脱时代的浪潮。如果今天的我们置身于那样的环境之中，又该有怎样的表现？这些问题没有答案。但问出口的那一刻，历史就不远了，它不再是故纸堆里的名字和年份，而是你我必须直面的、关于人如何活着的问题。

周琳在历史的暗处点亮了一束微光，虽照不亮整条时间长河，但足以让路过的人停下来，看清一张被遗忘的面孔，也借此看清自己。浮生明灭，那束光，依然亮着。